

“我心里要说的话”

——中国美术馆藏经典中国画《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创作故事

杨子

“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中国美术馆藏中国画《毛主席走遍全国》画面中，毛主席身着白衬衫、灰裤子，一手叉腰、一手拿着草帽，风尘仆仆的身姿和黝黑泛红的肤色，显示出户外劳作的场景，气定神闲、从容淡定的神情与眺望远方的眼部细节刻画，体现出毛主席带着对人民群众最深切的关怀，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万水千山。作品中没有任何陪衬的景与物，画家通过高超的造型能力和简洁的中国画表现手法，生动地勾勒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和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

1958年5月，原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共同组织一支由首都文艺界200多人组成的慰问团，赴十三陵水库参与劳动与创作。在十三陵工地的劳动大军中，文艺工作者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要接受体力劳动锻炼的改造，另一方面还要在劳动间隙表现这一宏大的工程。先后有数以万计的作家、画家、雕塑家、摄影家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创作出了大量的作品，画家李琦便是其中之一。

李琦（1928—2009），1928年生于北京，9岁时随父母赴延安，入儿童剧团。作为小演员，李琦随抗战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在各种艺术门类中，李琦最心仪美术。1939年抗战剧团与鲁迅艺术学院为邻，次年编入附属鲁艺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1941年又以抗战剧团为主成立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期间，李琦有机会聆听辛莽等鲁艺美术教员讲课，观看鲁艺的画展和壁画，跟随鲁艺师生写生。王朝闻还用泥巴雕塑了头像，供李琦练习素描，为他掌握素描基础提供指导。

1943年春，李琦加入西北文艺工作团的美术组，得到组长石鲁的亲自指教。随着绘画技巧的日益精进，李琦更多地投入到美术宣传的阵地中，刷标语、画漫画、刻印版画……其作品曾多次出现在延安儿童画展、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巡演地区的戏台上，甚至在窑洞里举办过小型个人木刻展。1946年，18岁的李琦离开延安到晋察冀解放区，次年正式进入华北联合大学专门

《毛主席走遍全国》是著名美术家李琦1960年创作的一幅经典中国画作品。作品表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到地方调研时的形象。

《毛主席走遍全国》
李琦 1960年
197×117cm
中国美术馆藏



学习美术。

1958年5月25日，李琦见到亲赴工地现场的毛泽东主席，深受感动，构思创作了水墨画《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一举获得了1959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美术竞赛奖。1960年，李琦又以该画为蓝本，将众多人物浓缩为一人，刻画了毛主席心系人民群众的亲切形象，这就是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毛主席走遍全国》。

李琦曾撰文详细描述了这幅画的创作过程：

这幅画创作于1960年。画这张画之前的195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这些领导人都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劳动，我正好也在那采访。那天人山人海，我就到了一个山包上去，想看一看全景。很凑巧，毛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正好经过这条路，我就像坐滑梯一样从山坡上滑下来，正好滑到他们中间。那天毛主席的装扮就是这个样子，风尘仆仆，走到那个地方，人多很拥挤。毛主席不断地向群众致意，与群众一起挥锹铲土，汗流满面。这时，人群中有一人递过一条毛巾让毛主席擦汗。毛主席擦完汗又把毛巾递给那个人，我看到后很是感动，就画了一张

《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画面就是这个情节。这张画在第二年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奖状。可我对这张画不是很满意。后来我就构思出不带任何背景的《毛主席走遍全国》。有一次在美术馆工地劳动时，我正在砸石头，突然，脑子里一闪，毛主席汗流浹背手持草帽的肖像出

来了，不要背景，毛主席的头发和手拿的草帽带都被吹动。不局限到哪个地方，能给人更多的联想。

新中国成立后，李琦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学院的教员，边教学、边创作，在中国画肖像艺术上艰辛探索。在延安的9年

奠定了李琦的艺术道路，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十几岁的李琦在鲁艺聆听毛主席“走向大鲁艺”的讲话，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坚定了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导向，创作了《农民和拖拉机》（1950年创作，中国美术馆藏）、《民族大家庭》（1952年与冯真合作）等汲取传统线描与西画透视之长，人物造型严谨，贴近生活、情真意切，颇具时代特色的中国画作品。同时，延安生活为他提供了不少创作素材，他日后画作中的人民领袖和文艺家是他在延安熟悉且敬爱的人，他们的精神风采常萦绕于心，激荡起他的创作热情。

李琦在《我心里要说的话》一文中写道：“让每一个人看到画都觉得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在注视着他。”这是作者赋予这幅作品的灵魂。

美术创作的典范

《毛主席走遍全国》可以说是新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毛主席肖像之一，在那个年代，报刊、电影、舞台、课本、机关礼堂、民宅，到处都能看到这幅画，这也是李琦创作进入高峰期的标志性作品。

在《毛主席走遍全国》中，李琦创作了重视调查的毛主席形象，采用了毛主席惯用的叉腰的姿势，捕捉了毛主席深入地方开展工作后稍事休息的瞬间。李琦创作出了一个和蔼可亲的毛主席形象，他手拿草帽，身穿白衬衫和深色的裤子，看上去风尘仆仆，仿佛是刚结束一天劳动的人。对毛主席形象的准确把握，特别是面部表情的从容与自信的神情刻画，以及微微仰视的视角，凸显出纪念碑式的庄严，起到了团结、鼓舞、教育人民的作用。

重大题材的绘画，往往依靠大场面与大画面，表现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时刻，而在众多重大题材中，能够抓住典型形象，反映典型瞬间，在“以小见大”中凸显重要意义的作品是非常难得的。李琦在《毛主席走遍全国》这一大题材的创作实践中，将毛主席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将笔墨的写意与造型的写实相结合，将宏大题材与朴素素材相结合，立意高远，真实感人，探索出新。

20世纪50年代后，写实水墨人物画是中国画人物画创作的重点，李琦作为领军人物，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毛主席走遍全国》这幅作品的创作中，李琦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画大量的生活速写，通过典型形象和情节产生立意构思。在绘画技巧层面，画面中衣褶顿挫的线条勾勒、脸部细节的皴擦以及草帽飘带的游丝取法传统笔墨，而手部的块面造型、面部的光影结构、人物自下而上的透视感，呈现出徐悲鸿所倡导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创作理念。这种创作方式，也被学界称为“徐蒋体系”的体面造型特征，这是以传统山水画画语言为资源，通过素描方法建立于科学观察、结构严谨、体积分明、以真实再现为目标的造型方法，探索出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一些新的表现规律和技法，求肖而又求妙，加强了中国画人物画的造型能力与表现力，极大地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

中国画是新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用中国画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时代风貌和刻画新的人物形象，成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蔡若虹在《关于国画改革问题》、李桦在《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等文章中均表达了中国画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新的美学原则，表现新的生活内容，刻画人民大众新的形象，涌现出了众多中国画探索新作。《毛主席走遍全国》就是当时美术创作的典范。

与此同时，新年画的传播也成为当时美术作品深受群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倡导，全国各地文教机关、美术团体和美术工作者热烈响应《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积极投入了新年画创作，掀起了一个创作年画的高潮。年画的印刷与影响力也突飞猛进，据统计，1959年新年画品种有6000多种，印数达3.1亿张。1950年，王朝闻在《端正我们的创作作风——把画领袖的工作提高一步》一文中呼吁“千百万群众需要领袖像”，号召画家创作以毛泽东形象和事迹为题材的美术作品。《毛主席走遍全国》这件中国画作品也伴随着新年画的传播，走遍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珍贵文物呈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往事

黄黎



抗大学员1-8期的毕业证书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这豪迈激越的旋律，坚定自强的誓言，就是著名的抗大校歌。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前身是1933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6月恢复开学后，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址设在瓦窑堡，后迁至延安，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抗大的招生广告

1937年1月21日，抗大贴出的招生广告，上面写道：学习期限是六个月，凡是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有志于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都可

以报名。虽然，招生广告上标注的考试科目只有政治、作文、口试和体格。然而学员们想要到延安踏进抗大校门，还要经历另一重考验，那就是日寇飞机轰炸。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感叹：“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然而，艰苦的生活条件却挡不住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坚定脚步。“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是许多青年的心声。

1937年1月21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开始了第二期的教学。第二期共设四个大队，学员1362人，加上甘南庆阳的抗大步校1400余人，共2700余人。其中一、二队是红军的团、师、军干部，如陈赓、杨得志、周子昆、何长工、冼恒汉、曾希圣、罗炳辉、赖传珠、王维舟、姚继鸣、邵式平、周纯全、王诤、刘希平、刘型、罗华生、张经武、叶绍华、季千辉、王尚荣、戴玉林、戴季英、黄春圃、谢朝文、陈克

寒、姚喆、伍云甫、谢高、张际春、陈奇涵、倪志亮等。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也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其中就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张学铭，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等。

三至八队是红军的连、营干部队，共753人。九至十四队为青年学生，共609人，编为四大队。四大队的学员大都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当时北平、天津等地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青年学生。另外还成立一个女生队共59人，其中有贺子珍、康克清等。

何长工曾回忆说：

抗大第二期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期，它是在新的斗争形势面前开办的，它负责培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较全面的干部任务。因此，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开学那天，毛泽东同志亲临会场，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开学不久，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教育委员会，政治部、训练部也先后建立起来。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为抗大的建设和后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何长工的抗大二期毕业证书，上面有毛泽东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从红大第一期到抗大二期、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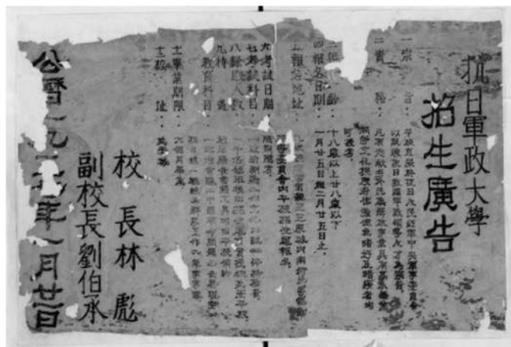
四期，校址都是在党中央所在地附近，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学校讲课或作报告，关心学校的建设。毛泽东对抗大的教育尤为重视，在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除了参加决定学校重大问题和活动，还经常亲临学校讲课。

当时抗大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理论课，如列宁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史等；也开设有一些军事课，如游击战术、军事操练等。

为了进一步加强抗大的建设，明确抗大的工作方向，毛泽东除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之外，还为学校选聘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例如罗瑞卿、张际春、滕代远、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等。同时还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

抗大师生的领章和教职员证章

抗大教职员和学员均着八路军服



1937年，抗大的招生广告

抗大学员的毕业证书

抗大从创建到1945年，共举办8期。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抗大发展到12所分校，培养和造就了20多万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他们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大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广大进步青年，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的互动，也是抗大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一个突出例子。1938年7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法国）、莫利·雅德（美国）、雷克准（加拿大）、傅路德（英国）一行四人来到延安，在参观抗大后，被深深地感染并认真地提出了希望成为抗大“名誉学员”的请求。

抗大和它锻造的抗大精神，在抗战烽火中放射出璀璨光芒，不仅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也在被追寻中薪火相传。新中国成立后，抗大培养的干部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1955年，在共和国授予军衔的军人之中，有7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47名中将和129名少将都曾在抗大工作、学习过。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成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的“最革命最进步”，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一种时代载体。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门